

纪实摄影家应是本土视觉代言人

——本报记者孙振军对话摄影家黄一鸣

黄一鸣

中国著名纪实摄影家。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海南省纪实摄影协会主席，中国日报社高级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上海郎静山摄影艺术三届金像奖及终身成就奖、中国艺术摄影金路荣誉奖，被《人民摄影报》等单位授予“人民摄影家”称号。

我的理念，记录就是珍贵作品。在报社工作，公共语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个人的摄影创作，但它们并不矛盾，我的很多专题都是在新闻摄影上进行了更高的升华。

孙振军：你是学画画的，怎么没有走上绘画的道路，反而从事摄影创作了？

黄一鸣：其实我从小就有摄影的喜好。我们全家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祖辈和父辈就非常喜欢摄影，他们从印尼带回了許多摄影作品和生活照片，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摄影的根。但我最早从事的其实是美术，我曾专业学习中国画两年。

1981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参加了广东省卫生宣教人员学习班，这让我真正地认识了摄影，从此走上摄影创作的轨道。特别是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我调入中国日报社成为一名职业新闻人以后，新闻纪实摄影也就成为我职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我的摄影成长是和人民日报社的培养，王文澜、方学辉等老师们的关爱，对祖辈摄影艺术的传承，海南这块热土的滋养等分不开的。

孙振军：近30年你出版了15本摄影专著，除了《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是拍摄海南本土的。你是有意识地坚持拍摄、编辑这套记录海南变迁的丛书，还是在边拍边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拍摄思路的？

黄一鸣：我从事摄影创作近四十年，出版了十五六本摄影专著（不包括主编和策划的摄影集），除了汶川大地震专题以外，主要都是围绕海南这片热土展开的。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大海，从历史人文到少数民族，从《闯海人》到《原住民》等完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专题。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多年跟踪拍摄完成的，比如《黑白海南》《海南先住民》和《海南“慰安妇”》。但有一些专题是在多年的拍摄过程中积累完成的，比如《闯海人》《海南纪事》《三亚往事》和《海南故事》。这其中还有几本是文字占比很大的图文书，比如《镜间本色》（报道专题、随笔集）、《一鸣集——纪实摄影断想》（理论、评论集）、《原告——日军侵琼见证者》（纪实文学）等。

要完成这些摄影著作，学习、思考、编辑相当重要。我现在还在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是写摄影师、记者在海南岛工作和生活的，这将会和我的纪实摄影作品相辅相成。

孙振军：你在《中国日报》做外宣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完成工作任务，所以公共语言是第一位的。个人的主观判断，哪怕是善意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被工作性质所允许的。那么你在拍摄中有这种矛盾吗？

黄一鸣：我是体制内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摄影创作是业余的。长期以来，做好《中国日报》对外宣传的报道是我的首要工作，平时还要做大量的新闻策划和日常工作，摄影报道只是许多工作中的一项，甚至是很小的一项。但许多专题的完成是和报社的外宣报道分不开的。《海南“慰安妇”》和《黑白海南》就是由报道的小专题引开来，进而深入采访拍摄形成的大专题。当然还有许多专题中的部分照片，都是在《中国日报》上刊发见报的。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家，有许多的摄影作品超越了见报的内容。这就是个人在艺术上的主观判断业余创作完成的，但这其实和工作性质并不矛盾，只是在普通的新闻摄影上有了更高的升华。

几十年来，我遵循“记录就是珍贵作品”的理念，保存好自己的每一张底片，记录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30余年来，我记录了发生在海南的大小事件和发展变化，这些许许多多的变化瞬间值得用纪实摄影的方式去记录。而且这些历史瞬间早已一去不复返，成为研究海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影像史料。

孙振军：现在海南各个城市的建设非常现代化，和北京、广州差不多，你之前拍摄记录的很多纯乡土的东西已经消失，成为一种影像记忆，你怎么看待不同时期海南的变化？

黄一鸣：海南城市建设和全国一样，在城市化建设的高速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旧貌换新颜，许多祖祖辈辈熟悉的场景已经消失不见。人类是有健忘症的，这种变化如果不用影像记录下来，我们很难清晰地回忆起它的过往，也会对目前的繁华、舒适、现代习以为常。

纪实摄影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像记忆的文本，它让我们深谙过去的足迹，这就是纪实摄影的价值所在。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建设国际旅游岛步伐的加快，许多原始的、本土的、“土老破旧”的原貌已经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和世界上每一个繁华大都市一样的繁荣现代、五彩缤纷。2018年将迎来海南建省30周年，随着多个国际航空港的建设，高级国际度假城市的形成，环岛高速铁路的开通，四通八达的城乡高速交通网络建成，数字化海岛城市“智慧岛”“云计算”“大数据”的建设，海南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理想工作生活居住地。那些过去的影像就成为了珍贵的记忆。

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海南，是改革开放、建省办经济特区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最初时期。社会在转型，各种冲突矛盾加剧，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在嬗变中成长。这许许多多的变化瞬间值得用纪实摄影的方式去进行记录。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海南影像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这就体现了一位纪实摄影家的使命、价值和责任担当。

孙振军：30余年来，你用相机收藏了海南各个时代的历史，这些影像究竟有什么价值？你的纪实摄影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黄一鸣：过去30余年来，我记录了发生在海南的大小事件和发展变化，记录了生活在海岛上的各族民众的生活，讲述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的故事。这些历史瞬间和体现人性关怀的精彩画面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是研究海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影像史料。如果没有这些纪实摄影作品，你很难靠回忆看清它的发展变化历程和脉络，这些影像是任何文字记述所不能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得到更高的体现。我的海南建省初期的纪实摄影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比如《三亚往事》，现在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撤县设市以前，它还只是一个小鱼村似的县城，是国防前哨。一个渔港、几栋楼房、一条小街道。但海南建省以后，三亚的国际旅游地位、被国内外重视的程度、开发建设的速度、国际高级酒店的数量、海陆空国际交通港的建设等等，发展之快，变化之大，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过去的纪实摄影作品，我们只能凭有限的记忆讲述它的过往，无法看到它和现在的强烈反差。这些记录过去发展历程中的纪实摄影作品就是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强大后的文化基石之一。《海南“慰安妇”》这一组作品，也随着这一历史事件被人们所重视，以及遭遇不幸的慰安妇老人的过世，加上影像的特有震撼力，越来越显得纪实摄影影像的珍贵。这些纪实摄影作品，都是拉家常似的平实记录，真实而没有做作，接海岛的地气，同海南同呼吸共命运，体现了人文关怀。（下转14版）

